

论管理知识的意识形态属性

付 晶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现代社会中,科学思想备受推崇,现代管理便兴起于对科学管理的探求中。管理学研究也试图借用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管理学科的研究成果塑造成客观有效和普适性的存在。文章基于批判的视角揭示管理研究的实证主义主导范式的错误定位和引导,指明管理知识的意识形态基本属性的渗入模式和具体表征。因此,文章提倡和呼吁在交互参与式的管理研究中对人类认知方式进行“理解”,促进管理研究的深化,期待管理研究更适用于社会情境的具体状况和现实需求,从而获得管理的解放和更长远的发展。

[关键词] 意识形态理论; 知识社会学; 批判理论; 双向理解

[中图分类号] 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2)04-0046-07

DOI:10.13967/j.cnki.nhxb.2022.0051

泰勒科学管理的巨大成就,让管理研究长期醉心于实证主义为我们营造的“技术理性万能”的美梦,限于“以自然科学的逻辑来塑造社会学科”观念的困取,所以盲目延续自然科学研究的老路。本文将从知识社会学意识形态理论入手,运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作为来质疑和批判管理知识所期望呈现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也为管理学批判理论提供一个合理性补充。

一 管理知识客观有效性的假象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统计判断、线性规划、博弈论、模拟法等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管理学科充分显示出其定量化实证研究的特质,管理知识的科学有效性得以凸显。然而,反实证主义之声对知识客观有效性的讨伐,技术唯上统驭管理研究的现实情况,管理实践异地水土不服的现状,本土化情景化管理研究的兴起,都逼迫管理研究开始反思和追问其学科知识本身的科学属性是否真实可靠,管理知识是否已经失去了科学客观的立场,甚至成为新时代的意识操纵者。

(一)管理知识“客观有效性”的来源:实证主义及其遭遇的批判

得益于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的

巨大成功,实证主义长期占据着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地位。然而,这种通过实证主义获取“有效”知识的方式却没有得到全面的赞誉,它不仅招致了更多的理论实践研究者的抨击和质疑,还面临着最现实的全球化管理实践水土不服问题的挑战。

1. 实证主义信仰的破灭

实证主义流派憧憬着社会学也许会像物理学一样,通过经验研究、因果归纳,建造高度抽象、逻辑严密同时又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社会科学体系,用以解释和说明个人、群体和社会现象,并获得预测和控制的功能。

诠释/解释社会学^①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特性予以了关注,他们认为人和一般物质是存在根本区别的,面对社会学领域范畴的现象应采用“理解”的方式^[1],研究主体和对象之间不应是自然科学的单向作用模式,而是一种双向交流、双向理解。这对实证主义流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统一于一体的自然主义科学观产生了冲击。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批判社会学兴起后,面对实证主义,他们展现出一种更加激进的批判、否定面目。他们认为实证哲学或经验哲学专注于发掘现实世界的数理结构,而社会是纷繁复杂的矛盾综合,那

[收稿日期] 2022-07-14

[基金项目]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南华大学)”资助(编号:21SZJS43010555);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一般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研究”资助(编号:XSP19YBZ194)

[作者简介] 付晶(1991—),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些不断变动的发展态势呼吁我们,不应当止步于简单地对社会生活所呈现的规律感兴趣,更应该真切地意识到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的未完成属性。这预设了“人的意义或本质应该以人的潜在可能性(而非实然状态)来界定”^[2],我们不能将人类再物化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客体,一种被动式的存在,应明确意识到人类的主体性力量,及其对社会发展起到的建设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明确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态度,直接造成了研究者对两类学科研究方法探求的分歧。

2. 普适性功能的失效

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紧密相连,推崇科学主义,强调实验方法、归纳方法、经验主义、数理主义等基本面向。早期的管理学研究就深受实验方法的影响,泰勒建立科学管理的三个基本实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通过引入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果。因此,罗珉指出,泰勒之后的一个世纪,实证主义范式成为管理领域的支配力量^[3]。

然而,20世纪以来,物理学的革命引发了人们对实证主义原则长期信任的崩塌,经验和理论先在性的激烈争论更是将实证主义逼迫到了越发狭窄的学科领域中。波普尔(Karl Popper)用“证伪主义”对实证归纳、经验至上的实证主义发起了挑战。随之而来的是归纳的逻辑被演绎的逻辑取代,证伪的方法成为主流。历史主义学派则不承认存在一种适用于一切科学理论的统一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发现、发明的逻辑,他们提出科学研究的方法必须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认为不同的学科应拥有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式,并且范式是发展的、历史的,会产生新旧交替,旧的总会被新的取代,长此以往以致无穷,这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质量互变规律一拍即合。

20世纪中期以来,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物理学等各类研究者都忙不迭地将目光投注到管理学研究领域,在造就了管理研究的百花齐放、成果丰硕的同时,也加剧了管理学科自身形成独立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的难度。孔茨(Harold Koontz)形容的20世纪中期以来的“管理丛林”的混战正好现实地反映了管理学科研究复杂的分歧现状和管理知识普适性功能的失效。

(二) 价值中立的玄想

在实证主义那里,是不允许科学家个人价值闯入的,他们主张将价值和事实绝对分离。现代管理的“中性人”假设就是将人的理性特质发挥到极致,

来调和“价值”和“事实”在实证主义那里的分裂。但这并非社会实践现实的真实写照——社会科学研究根本无法驱逐实验、观察和逻辑之外的东西,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是理论构造所必须的存在。正如波普尔、库恩、汉森(N. R. Hanson)、费耶阿本德(R. Feyerabend)等学者都提到的,“中性的观察陈述无法存在”,试图区分带有研究者价值涉入的理论构想和客观事实的想法与做法都是虚妄的尝试。

现实是,我们如何将文化规范和主观价值驱逐出我们日常所获取的社会知识,还是一个未知数。由于研究者本身获取知识的社会背景的差异,成长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无法创造出一个从真空世界出生、只接触到客观知识的个体。成长的经历和社会家庭等群体价值观的潜移默化,让研究者个人不可能完全剔除个人的偏见和价值观。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社会阅历,研究者也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判断去选择不同的管理学研究面向和方法。

因此,我们认为刻意地保持价值中立其实并不能真正减损社会学科研究价值的涉入。既然社会学科相比于自然学科要涉及到更多的关于价值判断、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影响客观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这样一些事实:从根本上说,社会领域的学科缺乏制造封闭的实验系统的能力,更无法完全保证数据的绝对真实。我们更希望看到学者承认和表明自我的价值承诺,公开接受评判好过掩盖事实,这才是对社会学科研究应有的尊重。

(三) 意识形态属性的涉入

批判社会学通过研究和批判工业文明问题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批判的视角。他们认为“社会学理论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及其发挥的核心作用应该用批判性检视处理当前的社会现实”,对于那些用单纯的描述和解释来维护和修补现有的社会结构,而拒绝、忽视真正可以改造和变革现实的举措的消极做法,应予以严厉批判^[4]。

社会学研究逐渐吸收了批判主义的研究立场。知识社会学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遗产中社会意识和存在的关系,并认为社会中的知识具有为特定社会集团服务的意识形态属性,具有服务阶级、服从资本的本质属性。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承认科学知识是在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利益影响下建构的,甚至是政治压力下的产物^[5]。法兰克福学派则对其发起了彻底的冲击。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理性通过现存的社会机制、个人的言论控制、大众舆

论宣导等途径来统治个人,形成压迫性力量。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表明,科学、技术事实上与政治关联。主张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由于其具有的实用性、功利性和顺从性,最终演变成为一种服务统治的工具,即成为意识形态^[6]。这导致的结果除了对科学发展的追逐,强调理性的权威,更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理性的独裁,或者说用理性外衣包裹下的权力关系。

那些崇尚将管理描绘成一种卓越的技术活动、造成一种中立的幻象的行为,看似在净化管理理论,使管理实践表面上远离权力和利益体系,而实际上,权力和利益体系一直就是管理出现和发展的一个条件和结果。管理知识在现存的社会背景中,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掌控并左右着人类生活^[7]。

二 管理知识衍生中意识形态的侵入模式

本文将通过对研究者、研究者所处实验环境、研究者和对象之间的交互关系,分析知识产生和传递的途径,去探索管理知识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渗透到社会群体和个人的。

(一)管理研究中意识形态属性的来源

基于社会境况决定论,我们可以明确,生活经验、社会特定文化背景、所处群体的要求等都会影响我们个体对知识获取的内容侧重、手段方法等等。我们将具有社会属性的因素称为“存在因素”^[8],这些“存在因素”一方面制约着我们认知世界现象的方式;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和情境时,又可能产生不同的思想和获取不尽相同的延展知识。

1. 研究者的价值介入

管理研究的事实是,管理学科研究者生存于有缺陷的、历史的、具体的(人类)社会现实中,依照知识的社会存在属性,或者说社会建构属性,管理学科研究者如何在这种环境中探寻出完美的、非历史的、无实质的知识^[9],这被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斥为“纯粹理论的幻想”^②。幻想“价值”和“事实”二分的韦伯(Max Weber),不但没有解救人性于现实水火,反而用官僚科层制的铁幕为现世的人们制造了牢狱。曼海姆(Karl Mannheim)也试图用看似阶级归属漂泊不定的知识分子来消除阶级意识形态的枷锁,结果却是起到了强化意识形态之争的作用。

管理研究者因其自身的成长经历、所获得的背景知识建构了一套自我行动的逻辑,这对其研究领域本身就潜藏了一种隐形价值选择。学徒背景成长

起来的泰勒,着眼的是“磨洋工”行为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对组织运转的影响;得益于哲学和心理学深厚学术背景的梅奥,便关注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现象;面临工业革命侵袭和资产阶级革命历程的马克思,便选择关怀工人阶级的悲苦境遇,斥责资产阶级的剥削奴役等等,这都是生存历史和生活境遇赋予的社会学科研究者的一种历史使命,指引他们去达到某种价值诉求。无论他们承载的是主流的、小众的意识形态诉求,或是反对的声音,都能从历史的演变中找到价值承载的根源和意识形态的归属。更甚者,管理学科的研究者在寻获自身研究的发展时,常常不得已去依附权力资本,以获得研究的资金和更广泛的群众参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表达资本推崇的价值观取向,成为统治阶级巩固地位的工具。

2. 研究群体的非理性妥协

管理学科不同于自然学科,大部分的管理研究,需要找到一批数量可观的群体,再通过观察、记录、量表测试、访谈等带有研究者主体“参与”模式的调查方法,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和具体的了解和评判。研究者在与对象接触时很可能产生价值认同上微妙的改变,正是因为研究者和对象之间存在一种参与互动的形式,因此,研究群体之间的交流探讨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价值层面的交互妥协。

科学知识社会学用“实验室研究”(Lab studies)^③指出,科学评价的中心问题往往不像人们常料想的那样是对真理的追求和确证,他们看到的是科学家如何将自己的发明和研究合法化并推广之让大众买单的过程。他们发现,科学家总是乐于用尽手段去扩大“信誉”,以获取更多的研究资金,有更好的平台使自己的研究得到关注,促进研究的应用性转化。因此,他们往往更倾向选择资本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在这样一个“信誉循环”中去获取所需的人才配备、设备更新、数据背景、论文指标、职称评级等等,不是知识本身的客观有效性,而是对“信誉”的追逐成了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动力。这种对研究领域、主题内容的选择性价值判断使得社会学科研究的性质不再单纯和中立,对“信誉”“权力”“利益”的趋从将我们认为是价值“真空”的实验室变成了妥协于权力意识形态主张的灰色地带。

综上可知,管理学科的研究主体并不能作为一个极端理性和具有中立自觉性的承载体来投身管理研究、探求管理知识。甚至那些看似完全科学意义上的实验室中也被笼罩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阴霾。

(二)个体知识获取的逻辑

知识社会学不仅分析知识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考察了知识的生产过程。他们认为我们看到的任何社会行动其实都蕴含着某种观念的主导,表面上思想观念呈现个体性,实际表达的是一种群体利益的诉求。

1. “自我”认识:基于群体反应的反思—决策—规范化路径

人作为观念性的动物,一方面产生对自我的意识,另一方面产生对外界的意识。这看似分割的两个方面,其实却处在交互影响的过程中。个体对自我的认识被称为“自我知识”,我们在社会参与中通过语言、行动等表现出来,并依照现实处境而不断变化,从而深化和改变对自我的认识。可见,“自我”认知和知识不是一成不变、固化的概念,而是处在个体主观的、不断演进的过程中。

(1)源于群体的看法

“自我知识”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我关于对自己的了解,而这种了解的来源却不是我自己独立可以做到,更是一种具有“外界”意义的存在。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④用“镜中我”的思想表述认知产生于社会互动,个人通过他人的看法和自我的回应来定义自身。曼海姆认为这种来自外界的“自我认知”包括交往时群体反馈的“整体一般的观点”和“其他成员的特定观点”。因此,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人物结构中,人们会自主地构造出自我的定义和自我应展现的形象特质。

(2)行动路径:反思—决策—规范化

在各式各样的群体生活中,我们通过意识到他人在群体生活中的行动,以及自我行动所得到的他人的不同态度的回馈,逐渐修正或强化,并内化这种行动模式,形成“基于他人看法”的“自我”认知,获得积累性的个人知识库存。因此,关于“自我”的知识,可以表达为通过对外界的回应行动来了解自身的一套认知模式,从根源上来说其实是始于社会群体的。

2. 群体行动的逻辑:从非理性到特定逻辑

综上分析可知,自我的认知源于对群体的反馈,那么群体本身是否有一种足够的张力将管理理念合乎群体“理性”,使管理知识能够做到对这一理性逻辑的把握呢?

知识社会学认为在群体形成初期,群体中的个人行为其实遵照一种群体的无意识动机的非理性逻辑,这也就是大众知识,这时理性逻辑还没有完全形

成。直到群体被进一步细分,以集团利益为驱动力的集团知识产生,当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可这一导向时,集团的行事逻辑就开始形成了,并内化为一种理性逻辑对老员工和新晋者产生作用。

比如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男权主义、个人主义等意识形态由于统治阶层用生物学、心理学等科学包装后,传递给大众一种男人天生就是力量和统治的存在,人天然地具有竞争和获取成功的斗争心观念。因此,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和成功的“个人”归因在西方社会的管理实践中都显得极其正常,并且和管理制度本身融合在一起。而在倡导集体主义社会的国家里,公有化和集体荣誉高于一切这类思想,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便成为两类文化相互认识的高门槛。尽管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在事实上它却时常成为主导我们日常行为选择的关键。这种最终被特定逻辑取代的个人行动逻辑过程,促使了人们形成和收获的知识受到了权力群体的控制,成为了意识形态的衍生物。

(三)双向交互模式对意识形态的包容

实证模式以一种注重量化研究(例如广泛应用的问卷调查法)的务实社会研究自居,试图在社会学科领域呈现“可重复性”程序过程和“可验证性”调查结果来标榜自我的科学性。这种科学实证主义的风气引导社会学科产生一种单向理解思维:社会结构和制度对知识产生决定作用。然而,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其实需要一种更丰富和深层的理解。因此,社会学研究应该对社会现象做出深入描述的同时,找出具体的文化意义^[10]。

知识社会学视野中的知识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交互建构模式,这种互动才是知识产生的前提,知识的基本路径是趋同群体和社会,并逐渐制度化,产生一种认同区域内的普适性。吉登斯^⑤认为社会学科研究应采取双重(向)阐释(double hermeneutic)^{[4]67}。双重(向)阐释一方面认为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源于外界社会生活领域的发展从而不断地形成阶段性的知识,另一方面这些概念化的理论语言又会回到社会生活中被使用、更新和改造,赋予更多的历史意义。这是一个双向和往复的过程,重构社会理论知识本身和社会生活领域^[11]。因为社会领域的研究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中所包含的历史的、特殊的、发展的各种属性。因此,我们会发现,双向模式使得意识形态在现实的、发展的社会行为中不断交融,变得更为隐蔽。这也要求我们作为社会学科研究者应尽量

避免以“主客”眼光看待社会现象,需要深刻立足于现象的社会背景本身,甚至站到研究对象的立场中去,深入地挖掘现象背后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提供给个人的价值倾向和选择,才能更为全面地分析行为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承载。

关于管理知识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说明,就是试图为我们在群体生活中找到自我的主体性定位,批判物化世界和官僚制度牢笼对思维的僵化,承认交往中主体的认同感和自治的责任感对社会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

三 管理研究的意识形态表征及其推进式发展

上文论述了管理知识从其生成到传播过程中所经历的意识形态侵入的具体方式,可知意识形态对管理知识的渗入是由始至终且不能剔除的强介入形态。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管理研究又应该如何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呢?

(一)技术和权力论对管理的绑架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产生了这样一个恶果,“科学”成为所有学科的信仰,而其他的例如价值、精神、观念因遭受排斥而无法获得应有的重视或处于从属的位置,管理研究也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

1. 科学技术的政治化

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批判理论表示,在现代社会,科学知识逐渐失去其客观中立的特质,沦为政治的工具,承担起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属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获得其合法性的过程中,避免了以往的统治阶层采用宗教神学、暴力统治等方式斩获权力的外在性行为,他们使用了一种更为隐蔽,却又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手段,“用技术的合理性来武装统治的合法性”^[12]。科学知识最初本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和宗教力量的客观武器,如今却成为了粉饰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标签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2. 权力阶级的附庸工具

主流管理思想依旧在强调“人们普遍相信,企业通常都是产生利益的、中性的、技术的‘生产系统’,平等地为许多股东的利益服务”^[13]。现实中,统治者作为技术发展的权力主导和资本控制阶层,理所当然地将管理领域纳入其工具箱。这些用科学外衣包裹着的管理知识,其实却正用科层官僚体制的铁幕,为特权阶层的意识形态构造起坚实的防御墙,并借助大众文化宣导的手段隐蔽地涉入“科学”

武器的控制属性。

哈贝马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决策论”的社会景象:上层包含政治精英集团或领导集体,他们为实现集团利益需要作出决策。政治精英手下是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和职业化的管理人员,他们负责掌握专业知识层面的问题,他们作为一种知识权威尽管充当工具却也依旧享有优越的地位,且因为他们服务于政治精英而获得了相当的权力。他们不但用这些知识作出决策,还需要为其辩护保障其合理性范围。

这种结构化管理模式,看似好像成功地为世界大工厂的运转提供了源源不断地助力,其实更像是一种现实世界的殖民,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陷在这一铁幕牢笼下,成为权力、利益和资本的奴隶。知识社会学和批判理论都旨在揭露社会现象中这些不合理的事实,使人能自知,进而转化为自主的个体,这便是意识形态研究的任务。

(二)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态势

植根于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管理研究,似乎给现代企业的发展传递了一个极其悲观的信号,科学技术正在以一种工具化人类社会的形式消磨人的反思性、责任感和创造力。当然,我们承认科学管理对管理研究存在积极意义,根据管理知识意识形态属性被确证的事实,我们应该将管理的重心更多地投射到人本身的需求上来。

1. 从单一到双向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是一个向自然生成,同时又使得环境向人生成的一个双重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一方面,市民社会在逐渐消解人对人的绝对权力,也就是使人们逐渐把对奴隶主、封建主的个人式崇拜和依附,转变为对物质财富和资本控制者的依赖和膜拜,这导致了人的物化。这是人类实践的一个必经阶段,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的发展阶段”^[14]。另一方面,人又具有主观地、能动地反思自我发展的能力,推动环境迎合人的想象。马克思正是在探索“理性”和“价值”“合题”的道路上,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议题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发展出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他认为这一实践过程是双向的、历史的、无限的。

因此,马克思提出人类的欲望和理想应该以现实的生态处境为基础,不能过分追求贪欲,强调人类理性的无限可能性,而忽略了社会原本的承载力。并且,他认为社会除了竞争性,还有追求联合而进入“人类共同体”^[15]的一面。而且,社会管理不仅仅

只是着眼于物质生产力的提升,更应该具有对人文关怀价值的重视。

可见,管理研究不是科技发展的一言堂,更应该认清人与环境交互生成的特质,启示人们运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管理中的个人、群体、社会,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强调管理的双向性和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2. 解放“科学管理”的禁锢:立足现实,符合需求

首先,管理知识被社会存在建构的事实告诫我们,过分苛求管理的科学属性,企图将管理学科打造成类似物理、数学之类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构想并不现实,根据具体社会情境的变迁会获得具体的、特定的符合当下需求的管理知识。例如,跨国企业在全球化经营中必须要考虑不同国家地区地域环境的具体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文化信仰的差异等等,不能因为之前模式的巨大成功就生搬硬套、完全复制。管理知识需要立足于现实背景、历史文化传统来获得更全面的补充。

其次,知识的群体来源模式要求我们不是将个人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个体来看。作为群体中的个体,管理研究必须探究个人背后的群体诉求所遵循的特定逻辑,毕竟我们个人获知的对自我和外界的理解都是通过和外界的交往而产生的。值得欣喜的是,确有一些管理理论以此为研究重点,例如,对人际关系的作用的研究,他们提出高凝聚力和和谐的人际氛围能够帮助人们获得更好的企业工作体验;福利研究、双因素理论、需求层次理论、ERG理论、公平理论、期望理论等各种关注于人的工作和生活全面需求的研究也获得了重视;企业文化、愿景、使命等观点的提出,各类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机构、社会关怀基金的诞生都传递了对组织中人性的关注^[9]。

只有切实立足于现实背景研究、群体意识形态价值分析、主体性有效沟通理解等基础上,管理研究才不至于一直困陷于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和被权力阶层别有用心利用之中。承认管理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不等于说拒绝管理研究的科学成分,适应具体情境的管理知识就可以被承认是有效的,这一有效性的获得途径不单是用科学来形容,更应该用“符合性”来凸显人性的本质需求,用“满意度”来测量知识技术的效果,用“适应性”评估知识在具体情境中的价值。

强调管理知识中意识形态属性的渗入旨在说明一个现实存在:管理研究及其知识成果无法避免权

力和阶级意识形态的渗入,科学技术的统驭、实证主义的主导却在企图抹杀人们对知识实然状态的认知,因此批判性研究就是要揭示这种不合理的研究态度,促进管理研究能得到参与式的双向理解和阐释的研究方式的有效应用。管理知识有效性的获取途径不应局限在对“科学性”的追求上,应该呼唤反思和批判精神在管理领域的回归,揭露管理研究中意识形态的渗透方式,发掘背后所承载的价值取向,从而使管理研究出产的成果能够更符合当下组织发展的诉求和满足组织中个人需求的实现。

注释:

①社会学界普遍将社会学研究分成三大理论传统:实证社会学、诠释或解释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

②“纯粹理论”假定了在思考知识的世俗方式中,通过理论的实践嵌入产生无瑕疵的知识的可能性。哈贝马斯认为,纯粹理论“希望所有事物都源于其自身,它服从于未被承认的外部条件并且变得意识形态化。只有当哲学在历史的辩证过程中发现扭曲对话的反复尝试和多次封锁顺畅沟通的暴力踪迹时,它才得以推进这一悬而未决的过程;人类迈向自主和责任(Mündigkeit)的进化。人们可以将自主和责任宽泛地理解为生命活动中的自治与职责。”

③广义的“实验室研究”包括由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的关于实验室的历史兴起,实验室工作的管理组织,这种组织对创造力的影响、对科学家职业生涯的影响,实验室交流的性质及信息流动的模式等。此类实验室研究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也有不少案例分析作品。参见Latour B和 Woolgar S:《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第2版,Princeton 1986年出版的第40页。

④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929),美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先驱。“镜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是库利在1902年出版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的,来形容自我是与别人面对面互动的产物。别人好像一面镜子,我的自我意识是我从别人的心里看到别人怎么看的我。他曾承认,“镜像自我”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詹姆斯论社会自我的观点(“有多少人认识他,这个人就有多少个自我”),也可追溯到J. 鲍德温的自我观点,鲍德温认为自我是作为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发展的。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自我这一课题重新恢复兴趣,特别是对团体行为的广泛研究,库利的著作又一次为人们所关注。

⑤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男爵(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 1938至今),英国社会学家,主要学术成就包括: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反思;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

性发展的反思。

[参考文献]

- [1] 殷鼎. 理解的命运[M]. 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88:11;241-242.
- [2] 黄瑞祺. 批判社会学[M]. 台北:三民书局,2007:33.
- [3] 罗珉,李映东. 混沌理论对管理学发展的启示[J]. 财经科学,2004(6):20-23.
- [4] [英]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M]. 田佑中,刘江涛,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5] 刘晓力.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J]. 哲学研究,2004(11):61-66.
- [6] 郑杭生. 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5.
- [7] WILLMOTT H. Studying Managerial Work: 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J]. Managerial Work,2019,24(3):305.
- [8] [美]刘易斯·A·科塞. 社会思想名家[M]. 石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85.
- [9] [瑞典]马茨·阿尔维森,[英]休·维尔莫特. 理解管理:一种批判性的导论[M]. 戴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71;232.
- [10] 阮新邦. 批判诠释论与社会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序5.
- [11]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3.
- [12] 程巍. 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32.
- [13] SHRIVASTAVA P. "Castrated nvironment: Greening Organizational Studies"[J]. Organization Studies,1994(5):705-726.
-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
- [1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6.

On the Ideological Attribute of Managerial Knowledge

FU J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ideas, which made the modern management arose in the aim of the realization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are highly praised in the modern world.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social studies, management science also seek for objectivity, universality and validity by drawing on the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intend to reveal the misguidance and the wrong orientation of positivism paradigm in the management studies and indicate the infiltration model and specific characterization of ideology in managerial knowledge. So, it calls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to the cognition on the participative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expects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can be more applicable to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actual requirement in social situation, thereby to get a thorough research and have a long-term development.

Key words: ideological theory; sociology of knowledge; critical theory; dialogical understanding

(本文编辑:刘衍永)